

歷史終極的意義

——牟宗三先生之「歷史哲學」中的永恒訊息

■ 李利國

一、前言

中華民族的生命始終根植在艱難奮鬥的途徑裏，如果我們不推諉，我們有責任在烽火繚繞的記憶中，重新創造一份強健的生命情操與凜然的歷史信念。然而二十世紀的我們，所面對的却是一個最尷尬、最茫然的時代。由於受到西方文化強烈的影響，與大眾傳播工具的發達，使各項觀念毫無斟酌性的進入中國的心靈；更由於中國傳統文化未能適時調整，而導致國人心理上的迷惘。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嚮往，是我們不治的沉痾；生命學問的變質，更造成了價值判斷的浮慕。由這些方面，我們也就可以了解，何以這個時代如此僵硬，如此了無生氣。

事實上，今天人們最大的困擾，還在無處尋覓一個精神出路的指標。從事人文研究的學者固然也展示了許多傳統的关注，却只是些人類過往活動的片斷痕跡，徒然使整個時代的精神益加趨向迷惑、趨向破碎。因此，做為一個現代的知識份子，我們必須努力掌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以期將種種文化上的矛盾與缺陷納入和諧而圓滿的正途上，以求其合理的發展

。如此，民族或者個人的精神，才有出路可言。

當世人都活在自己片斷的生命史中，無暇考慮並發掘中國全體生命的意義時，牟宗三先生却透過「歷史哲學」一書，撥開了蓋在時代上的迷霧，直接注目於中國這個活的民族文化生命，文化精神的來源和發展的路向。由於他把中國歷史文化當作一主體的存在，故能由自己的生命心靈，透到表象的「史實」的後面，去體會並鑑定內存於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永恒價值，進而向世人傳播一份生命的學問。中國社會一向是個體人格徹底表現的世界，因此有盡心盡性的「道德人格」。也有盡才盡情的「藝術人格」！面對這樣的歷史傳統，我們該怎樣生活？怎樣成長自己呢？在「歷史哲學」中，牟先生提出了最懇切的盼望：「民族的發展重在實踐道德的內容。」

二、歷史與現實人生的關係

這個研究與生活的新觀念，落實在人生上，我們相信牟先生的終極理念在要我們認真的活、謙虛的活。因為是認真，我們就必要努力扮演自己這個角色，更且時時考慮世界需要我做什麼樣的奉獻。因為是謙

虛，我們才能永遠地空出一塊心靈，以容納新的生命內容。一個真正生命的成長，絕不是局限在自我心靈的領域中完成的。它必須勇敢地面對外界的挑剔，世事的諸般矛盾。只有認真，我們才能逐步調整自己，而恰如其份的介入錯綜的人世；藉着謙虛，我們才能把生命當成生命，去發掘並鑑定它全部的意義，進而用一顆誠摯的心負起整個歷史的擔子。

所謂歷史的擔子，是指歷史要求每個民族從目前的境界超越至另一更高層次的和諧境界。是以，牟先生強調：「人類的歷史必然是趨向普遍心靈的客觀化而為大同。」傳統的中國文化意識，由於在道德主體一方面的高度顯揚，因而缺乏西方「分解的盡理精神」，以致知性主體不立，未能建立西方方式的科學與民主政治；但由於其在「道德主體」一方面的極致發揮，亦自有一套獨特的政治形態與理想。這也就是說，中國歷史的發展全是道德用於政治的系統，其道德心的延長，直接支配着政治層面上的人格。於是在盛世，則表現為聖君賢相，在亂世衰世則表現為對非理性，非道德的黑暗勢力的搏鬥，而成為氣節之士，諍諫之臣。是以中國雖無「政權的民主」，却具「治權的

民主」。這種「治權的民主」的終極理想在盡民族之性；換句話說，就是要透過傳統的人格精神以抒發不忍之心；以求得一理性光明的安排，使各種非理性非道德的勢力皆置之在此一「知性的格局」下，使之止於此，限於此，終而自覺於此。

當然，這份新「政統」的建立，一切的關鍵自然還在「道德主體」的挺立上，亦即是內依「道德主體」的知性原則，而加以安頓的。牟先生說：「中華民族生命之途徑、吾人建造近代化國家之途徑，端在於客觀實踐中由存在的證悟以透顯與互融個體性與普遍性以盡民族自己之性上。」（附錄頁二十六）。故中華民族的「盡其性」，首重個性的自覺，進而將此「道德的主體」湧現於「分解的盡理精神」之中，最後使個體性的真徹了悟，在觀念的普遍實踐中得以完成。完成之後的個體性，與知性主體的普遍意識相互融合，方可使中國文化的全幅價值透顯肯定。這份肯定的信念便是本書切切所要表達的中心概念。

三、歷史文化源起於觀念形態

然而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何以特顯「道德主體

」，表現「綜合的盡理之精神」與「綜合的盡氣之精神」！而缺乏西方文化生命一往呈現的「分解的盡理之精神」？牟先生認為主因還在內存於民族生命的「觀念形態」不同之故。蓋觀念形態導引文化系統的創立與發展。就民族言，觀念形態便是它實踐的方向與態度。有方向，便兼具理想；有態度，也就同時擁有獨特的精神意識。東西方意識的醒覺自然不同。在中國乃源起於「憂患意識」，而西方則起於「恐怖意識」。牟先生說：「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絕不是生於人生之苦罪，它的引發是一個正面的道德意識，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一種責任感。」（牟著中國哲學的特質，頁一五）。蓋中國的先民生活艱困，故一心專注在人世環境的開拓；其戒慎恐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重在繼承祖宗的功業，與開發後世子孫的生命，故著心致力在透過自身有限的生命，上接下合，貫穿成為無限的生命。此等要求的無限伸張擴大，遂涵括及整個天地宇宙，最後凝成悲天憫人的觀念，更由之引發宇宙悲情的「仁」的意義。

而西方先民在面對巨災慘禍，天地之蒼茫時，所引起的不是悲憫就業的心理反應，而是惴惴無依之感

，故唯有向一特定對象哀求寬恕，此意識的發展，最後遂凝為救贖的宗教觀念。中西文化在本原上的根本差異，是我們不能忽略的。牟先生解釋說：「那抒發理想的道德的心，其內容與方面非常豐富，而其本身又帶創造性，而人又受動物性的限制，所以它不能一時全體表現；既不能一時全體表現，則自有各種方向。」（頁三）。歷史精神的根基為觀念形態。因為觀念具有創造性，因此帶有提昇作用。不論形態的發展如何，方向的曲折如何，它的根基總是向上的，總是在求調護生命，安頓生命的。其表現在外的措施，則是修德安民的事業。若是有所不同，必然只是方式的憑持有分別。

但在西洋，因為「分解的盡理精神」的特別突出，以至人與宇宙各自為一不相連環的平面，唯講權利與義務，合理與僭越，人世的情意遂零落一空。世人如此生疏冷硬，天上人間的裂痕亦日益擴大，而集團終淪為侵略鬭爭，錢穆先生說：「西方之一型，於破碎中為分立為並存，故常務於力的鬭爭，而競爭為四國之鬭。」（國史大綱引論頁二十）。在中國則因「知性形態」的尚未釐清建設，所以在國家政治法律方

面亦尚未能有合理的安頓。當維繫社會人心秩序的「禮」一旦失墜，「敬德」觀念亦必沉淪，歷史上一切毛病與苦難，周而復始的悲劇皆是由此來。故錢穆先生分析說：「中國史之隆污升降，則常在其維繫國家社會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此等情感，一旦陷於麻木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繫，而大混亂隨之。」然而人類既已從原始洪荒中走出來，是不會願意再走回那水深火熱的深淵中的。為了更適宜的生活，更能在生活中擁有生命的價值與幸福，我們相信，這兩種精神終有一天會合拍共弦的。這一種新的普遍的精神實體必將由潛蓄狀態中自覺的湧現，其基本的因素是各民族皆有求圓滿體現的本性，這本性在發展線上是相同的，即是持續一種發展的力量，向更欣然完滿的境界移動，只要通過這項「存在的證悟」，人類的精神最後必將再度相逢，相互彰著、相互輝映。「人類歷史的發展便在步步彰著一向上的精神實體。」牟先生所要傳遞給我們的不正是這一份永恒的訊息嗎？

四、歷史演進與歷史哲學的關係

然而此精神實體在歷史的發展中，並非始終向上

的，有時它也呈現一種非理性的氣息，向下向反，甚至乖謬邪僻，然貫列於史實的承續中，則亦有意義與價值。更且「道德的心」的全部內容也可由觀念形態的豐富曲折過程中完全誘發出來。其在現實上的發展所以有曲迴宛轉、駁雜漆黑的一面，正是因為人類精神生命中隱含動物性的緣故。而各民族所以有歷史，即是因各民族皆在實踐理想與道德的過程中，宗三先生說：「若在上帝，則無所謂歷史，亦無所謂歷史精神。」是一針見血的見解。所以，歷史是人類透過智慧，使一切行為漸趨向理想的一連串努力的痕跡。

因為歷史建立的基址是表現道德與理想必然可藉理性以實踐的真理，因此一切精神表現，文化意識的擬發都有理路可尋，都可與意義層次會通，而歷史哲學即在探求這會通的根據與途徑。牟先生說：「心德內容在有限制中表現突出，為一民族之歷史文化之特殊性，然而無窮無盡之心德內容在發展中步步擴大與彰著，則亦是各民族之歷史文化之可融通性之根據。……心德內容必在發展中始表現而為精神價值，種種形態、種種成果。……凡是價值都當實現，而且都能實現；凡是價值都不相礙，都當相融，而且都能相融

；一時的僵滯與固執並無關係。此便是各民族之歷史文化之可融通性。」（附錄頁二十八）。透過這段話，我們可以深切的了解，歷史哲學在探求一民族全體生命在每一時代呈現的精神，統攝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反映出一種上承下啓作用的脈絡所在，並試圖說明此精神何以向此趨，不向彼趨的理則性。

五、歷史終極的意義

我中華民族的文化意識源起於道德的心，故落於現實的發展，是在政治上表現敬天愛民的善的理想，是以二帝三王敬心施政之道，即稱為外王事業。唯從堯舜歷夏商至周，所謂外王，只是由責任心的自然抒發而使我直接被肯定，並非由自覺心的反省而做道德的肯定，這一方面必待孔子乃得由隱伏而顯彰。孔子將外王事業一變而成內聖的道德實踐，不僅顯明了道德的意義，而且確立了由德性的實踐做起，以達政治理想的實踐的序列，遂成為我華族歷史精神的具體觀念。顯然的，生命的調護、生命的確立為推動華族歷史發展的力量，是不容置否的。

牟先生又說：「歷史之精神表現即是一部在發展

途中企求完成之哲學系統。」（自序頁六），復爲「歷史」注入另一層的內容。「道德心靈之內容，即所謂心德無窮無盡，而人又是有限的存在，故其心德之內容決不能一時全現，而必待於在發展中步步自覺、步步實現，因而亦步步有所成就。」（附錄頁二十九）。因爲歷史的發展，是以「心靈的向上性」爲中心，而展開它的各種形象與意義，故內可照察人格精神的風采，外在求新局式的創造，是以歷史上處處可見遼闊的生機。歷史哲學不僅要探求歷史發展的種種內容形態變化的理路，並企圖了解歷史真正存在的意義。在宗三先生的「歷史哲學」一書中，我們會了解，一切文史的研究，終極要回歸於現實的生命方有價值。當世人都渴望投入西潮的洪流，做一名弄潮兒，而無暇體認中國文化時，他著書的苦心是值得我們沉思的。他要喚起我們生命深處的情感，而把中國歷史當作活的生命的成長來感受。

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中，雖然時時可見非理性的精神形態以及文化理想的失墜，然而統緒於系列的承續中，其價值仍可融通而不相礙。因這也是一種存在的事實，故可由理想的步步實踐，步步證悟中求步

步轉進。理性精神亦必步步提昇凸出，而此凸出的精神必隨民族的擴大而彰著，而帶憧憬的性質，終而成爲民族發展的目標與活動的基礎。是以歷史的體系是受人類精神生命的理想所支撐。民族生活愈豐富、民族發展愈開放、歷史的無限價值也愈清晰。於是我們可以重新觀照一句話：歷史真正存在的意義，在展示人性存在的光輝，在引發人類對自我生命與人類整體生命史做極致的考慮與價值的開拓。

附：歷史哲學，牟宗三先生著作。臺灣學生書店出版。

張伯權譯

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三版）40元

，父親（二版）30元

俄羅斯文學史 45元

楓城出版社印行

全省各大書店均售